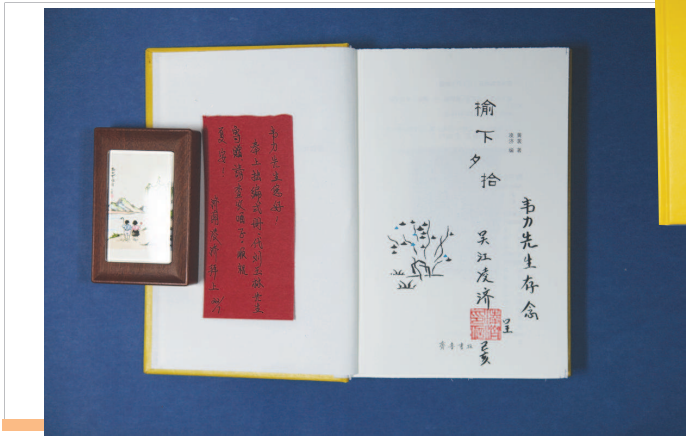


得书记

爱书人黄裳的真性情

■ 韦力



▲《榆下夕拾》
黄裳著
凌济编
齐鲁书社出版

该书为编者凌济先生所赠，内容主要是收录黄裳文集之外的一些佚文，这种作法可谓功德无量。凌先生一共赠了我两册，一册光边，一册毛边，其中一册乃是代刘玉林先生所赠。大约三年前，我在济南古旧书店举办了一场读者见面会，正是在那次聚会时，见到了凌济先生，在聊天中得知他藏书的重要专题之一就是黄裳著作，他在谈到黄裳著作的版本时如数家珍。我对黄裳先生一向敬仰，但对他的著作远无凌先生这般熟悉。而今看到他所编该书，书后附有他编的《黄裳著作书目编年》，此编以时代为序，列出黄裳每一种著作的不同版本及出版时间，以及是否平装、精装，具体开本、页码、相应的用纸和具体的印数等，如此详细的资料，需要下很多工夫方能收集齐全。

本书扉页印有“谨以此书献给黄裳先生诞辰100周年”，猛然意识到黄裳先生已经离开他所热爱的藏书七年了，而黄迷们对他的挚爱丝毫未曾减弱，套用一句陈词滥调：黄裳先生依然活在爱书人的心中。这真应了那句话，书比人长寿。

本书前有陈子善先生所撰《琐忆1980年代与黄裳先生的交往》为代序，子善先生谈到他拜访黄裳先生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的子善先生还很年轻，他认为自己记忆力强，所以没有写下日记，而今他跟黄裳交往的很多细节都已不复记起，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黄裳先生的日记中倒是记载了很多他们交往的细节。三

年前，陆灏先生从黄裳日记中摘录出一些1980年代日记中与子善有关的记载，而这篇代序就是以此为线索，来笺释黄裳日记中所载之事的本末。由此可以看出，日记的重要价值。

黄裳先生一向以沉默寡言著称，子善在代序中则说：

黄裳先生晚年常被友人以“沉默的墙”相拟，访客往往与他“相对枯坐，‘恰如一段呆木头’”（黄裳《跋永玉书一通》）。但以我与黄先生上述交往的亲身经历，或可证明至少在1980年代，只要话题投契，他也会打开话匣子，也会兴致勃勃地聊天，甚至谈到高兴处，也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

看来黄裳先生的沉默乃是未曾遇到解颐之人，否则的话，他也会开怀大笑。代序之后是黄裳先生的女儿容洁所写《来燕榭》一文，文中很多细节是他人难以知之者，而我也正是通过此文，了解到许多以往未曾听闻过的细节，比如她母亲的长相，而我在黄裳的书跋中常常看到小燕的落款，还听陆灏讲过这是黄裳有意这样来写，以此来体现琴瑟之情。容洁在文中还写道，为了买书之事，母亲常跟父亲吵架：

记得父亲母亲也有吵架吵得很凶的时候，十之九是为了父亲买老书。父亲为了买老书，卖掉了徕卡相机，也卖掉了手上的名表。

母亲说，只要旧书店老头来敲门，一声“黄先生”，家里的钱就不见了，明朝有没有钱买菜也是不要紧的。父亲得到了心爱的老书，将它们摊在大床上，仔细欣赏那黑口、白口，无论母亲如何说，他都不再发出声响了。偶尔，父亲也会说母亲是个“关不掉的无线电”。吵架过后不一会儿，他们就一起欣赏起版本来。母亲爱看那些明代木刻版画，还特喜欢古代艺术品，她有时拿起一本《艺苑掇英》坐下欣赏半日。

想来被老婆埋怨是不少爱书人都有过的遭遇，爱书人是一种奇怪的生物，当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时，一切红尘琐事都已不复存

在。可惜每人都有一个浓重的肉身，藏书家又无法做到灵魂出窍，在爱书与俗事之间所产生的各种纠结，绝非外人所能体会。

本书还有黄裳的外孙刘丰德所写《纪念黄裳诞辰100周年》，这篇文章写得颇为有趣。刘丰德在文中谈到他在高三时，拿着一篇文言文向外公请教加点字的含义，外公作了解释，然而标准答案却与外公所说不同，外公看到后勃然大怒，当场说出了“放屁”二字。想来这才是黄裳的真性情。对于黄裳的生活方式，文中还有这样的描写：

外公是一个比较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能也和他曾经赚的稿费比较多有关系。外出吃饭，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外公对用餐环境很看重，每次吃好虽然不是他结账，但必定要把账单拿过来看一眼。

这才是有情趣的黄裳，而这样的写法，也只有自己家里人才写得出来。凌济先生能够将黄裳之后两代人的文章汇为一编，这让我感佩其所下功夫之大。凌先生曾一一致函与黄裳有交往之人，索要黄裳的通信，然后将这些信编入本书之中，那些年黄裳先生也给我写过一些信，可惜这些信打包堆放在书库内无法找出，故未能汇入该书之内，而我通过这些信件，了解到了黄裳与他人通信的内容和他对某事的态度，这一切都体现出了凌济对黄裳先生著作的酷爱。



（上接第一版）“这是运河给我的第四个印象——蓄满辉煌。”作家细数着“运河教会他的那点儿事儿”。

《天下在河上——中国运河史传》就是这样一本以江河为传主，以跨学科的视野，上下三千年，纵横几千里，系统呈现了大运河的活态历史传记，但从蔡桂林的自述中，不难看出，这本书之所以格局开阔，文笔细腻，之所以能凝望中国运河的大开大阖，倾听其大喜大悲，呈现其大壮大美，不只是作者史书中滚爬多年的成果，也是来源于已经刻到他骨髓中的“运河基因”：“亲历的运河记忆和本书的写作都蕴含着一种不可言喻的澎湃，双向激活造就了《天下在河上》的肆意流淌。我不知道这些算不算‘乡愁’，但我知道这里有我的初心。”蔡桂林感叹道。

同样的，徐则臣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初中住校时，校门口洗漱之地正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石安运河。河流伴随着少年的成长，也见证了一位作家的成熟，20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被徐则臣一点点放进了他的小说里。徐则臣认为，“题材、地域乃至某个多年来挥之不去的主题，在长久的孕育和成长中，都会附着和生发出大量类似故乡般的记忆和情思。”运河之所以对他那么重要，并非因为这个题材大，而是因为他从小熟知这条河，“运河是我文学意义上的原乡。它不仅存在于我日常生活中，也是指引我认识这个世界的先导，所以我习惯通过河流来开展我的文学世界。”

读者的喜爱成就了运河写作热，喜爱背后是中国人的情感共鸣，而这种共鸣正是从千千万万读者生长于运河边的共同经验里生根发芽的。运河是作家们文学意义上的原乡，也是众多国人现实意义和空

间层面上真正的故乡。

后天意义的母亲河，散于日常的烟火气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济宁以北的运河近百年不再通航，大运河的许多河道甚至已经干涸，“有的地方的故道变成了平路，当地人对运河完全没有概念。”亲自走过运河的徐则臣介绍道。如果说，作家们是为自己的“乡愁”而书写运河，那书写和阅读运河对当今中国的意义何在？对此，《天下在河上——中国运河史传》的责编黄诗韵这样解释：“江河是展现国家悠久历史和精深文化的一种独特视角，而运河在其中显得尤为突出，运河严格来说是一条人工河流，中国古人将它们一段段修起来，再连接起来，这里面凝结着先人的血泪，闪耀着民族的智慧，也就更能折射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成长。”

有意思的是，几位作者不约而同将大运河与万里长城的价值进行了比拟。两者同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名片，后者的名气却显然远胜前者。

夏坚勇想起了赞颂长城的各类歌谣，它们煽情，冲击人们关于历史、民族和人生的忧患意识，在他看来，长城更多是一种精神象征，而大运河则是实实在在地滋润，孕育了整个民族的强健和鲜活。这大体也解释了为何没有一首歌是唱给大运河的——流淌的河水太难歌颂，人们往往容易忽略身边的伟大，而大运河的意义是早已消散在寻常生活中的烟火气。

蔡桂林则认为，其实大运河比同属人工工程的万里长城更加伟大，更加可歌可泣。如果说筑长城是为了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它的基调是阻挡，大运河则全然不

同。它的诞生是为了尽可能地沟通和交流，显示着中华文化中积极进取、追求融合的宝贵质地。长城的意义早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只剩下观赏性，而大运河的意义却随着时间累积日益丰富。“中国运河在中华文化史上有其独特之处，甚至可以说她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化身，运河流淌三千年，用一河清水养活了自周至清所有朝代的历史之河，民族的心路历程、历史朝代的时政气象、民族融合的历史态势意义包孕其中。对之的史传，就是对中国文化史的叙述和阐释，就是对中国文化的致敬，当然也是对当下中国‘文化自信’的激情回应，是对‘文化创造’的一种启示性揭示。”蔡桂林这样总结。

而在徐则臣看来，重新反思大运河，它的意义怎么估量都不为过。“在我看来，如果说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先天意义上的母亲河，那么大运河完全称得上是我们后天意义上的母亲河。”徐则臣说，“如何梳理出运河可靠的历史，以及如何在今天有效地唤醒运河，就成了一件重大的事。无论如何，关注运河的人越来越多总是好事。”

中国的大运河，世界的运河

徐则臣曾说，不论离开故土，还是走向异国，“到世界去”都是他创作小说的一个总方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北上》明明写的是一段关于中国大运河的“秘史”，故事却从一名意大利旅行家对1901年时局动荡的中国所进行的文化考察中展开。

“我们看多了中国人眼中的大运河，兼听则明，我们也应该知道别人是如何看待大运河的。运河在很多国家都有，都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像京杭大运河

（包括之前的隋唐大运河）之于一个国家的重大切要，大概中国是头一份。”徐则臣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在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后，已经被迫“全球化”了，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中国已经不再只是中国人的中国，而是整个世界的中国；一个真实的中国，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眼里的中国，而应是世界人民眼中的中国。不同的目光和视角下的中国的集合才是更加真实的中国。同理，运河也不再仅仅是中国的运河。“所以，我引入了外来的、差异性的目光。不是为了‘到世界去’而‘到世界去’，而是你已经在‘世界’上了。”

运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也是作者和出版社之间达成的默契。“展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固然是我们的目标之一，但我们更希望读者结合后面大运河的衰落乃至停航，从这大起大落之中思考我们祖国在如今所处世界格局之下该如何开辟一条新的航道，走向广阔的大海。而我们又能为这条新航道的开辟做出些什么贡献呢？”据黄诗韵介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这套“中外著名江河史传丛书”原本是为了献礼建国70周年而策划的，但随着项目的推进，出版方想到，在新时代要有国际性的眼光，不能局限于我国，他们更希望在后续的组稿中能够为世界各地的著名江河一一作传，反映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因为江河是人类的母体，而图书恰恰是人类文明的载体。

所谓“天人合一”，是古人留给我们关于大运河的哲思，而如何让这条大运河继续流淌下去，让它在新时代的世界格局下被“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给予全人类更多的启迪，或许我们还仅仅是鸿蒙初辟。